

第一章

转型——从社会到心理的 一场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历史之光又一次照亮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当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而苦苦挣扎，当亚洲四小龙的强劲发展走势跌落的时候，中国一位智慧老人接过了发展的薪火，迅速地将积淀了数千年传统文明因子的古国人民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光荣与梦想时代。当我们以自己短短十多年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在强权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多极世界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资本的淘金热潮的时候，我们已不再需要以祖宗的四大发明来夸耀于世，来补偿我们失去的自尊了。这一切的取得，源起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

第 一 节

改革开放——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就其实质而言，是打开国门，向一切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经验、技术。这是继承式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社会就其

发展而言，包括创造式发展和继承式发展两种类型。继承式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对于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一 继承式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

社会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发展。人类社会具有动物世界所没有的发展，是因为人类社会在个体遗传之外，衍生出了一种新的遗传方式——社会遗传（社会继承）。动物只有生物个体遗传，因此，后代继承的只是生物属性和本能，其适应生活的能力只有经历个体生命的全过程才能达到前一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由于动物的发展表现为个体生命的简单循环，因此，动物只有缓慢的进化而没有发展，数千年物种进化中变化的可能性极小。

人类具有语言，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借助于语言使得个体之间的思想、感情、知识、经验的直接传递成为可能。借助于语言，通过社会约定又创造出了文字、符号（书面语言），使得思想的交流不再局限于直接的个体的方式，而衍生出了社会的、间接的方式，从而扩大了人类交往的范围。如果说，是思维使人突破了生物学的界限，使人得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把自然力转化为实践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那么，是语言，以及随后的其他人际交往手段，使人得以结合为社会，使个体能力得以结合为类能力。这样一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已不再是生物个体发育史的一种简单重复，而是代的递进。前一代借助语言、文字，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把自己毕生努力所得的认识世界的成果、实践活动的能力社会化、对象化为人化的“第三世界”（由书籍、录音、录像、艺术品、生产生活资料等等

构成的世界)。后一代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实现自身的社会化,掌握父辈对象化了的认识成果和实践能力,将这种社会实践能力内化为个体的能力,站在父辈的肩膀上开始新的发展。

社会遗传具有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纵向遗传表现为异代之间的继承,横向遗传表现为同时代人之间的交流。纵向遗传从个体角度来考察,体现为个体社会化过程。所谓个体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自身与社会的双向互动,逐步掌握知识、技能和社会规范,由自然人转化为一个能适应一定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点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使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即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没有这样一个父代在生物遗传之后的社会遗传过程,个体就不可能获得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就不能适应和参与社会生活,就永远只是一个生物个体而不能成为社会人。狼孩、豹孩的事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它是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机体的新陈代谢实现着由个体生命的短暂向类存在永恒的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人类自身再生产(自然个体的生育)只提供了实现这一过程的前提。因为社会机体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必须有自身的规范和各种不同的角色。社会的新陈代谢所要解决的是社会机体的缺位问题,这就必须有能直接承续缺位角色的新角色代位。自然人必须经过社会培育才能转化成社会角色,掌握角色规范和技能,作为社会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遗传过程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另一个侧面,是再生产过程的继续和完成。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得以避免前后的重复,才有类的延续和发展。

第三，它是为人所独有的过程。因为只有人才具备实现社会化过程的基本条件。首先，人有文化。人类长期创造和累积的社会文化是个体社会化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就谈不上个人的社会化。其次，人有抽象思维的潜能。抽象思维的潜能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为一种现实的能力，使外在的知识和观念内化，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四，它是社会和个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个体既是社会遗传的对象和客体，又是社会遗传的主体。一方面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和不同方式对个体施加影响，引导个体进入社会，把个体培养成特定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个体反作用于社会，有选择地、创造性地接受社会影响，自觉地按照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和要求塑造自我。社会遗传过程是在双向的相互影响过程中实现的。

二 横向遗传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横向遗传是社会遗传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在时间上先创造出来的成果向同时代的其他成员传播的过程。虽然形式上它属于同时代人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不同于异代之间的继承，但从性质上说，它与纵向遗传一样是对先于自己创造的文化成果的一种吸取，因此可视之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继承。横向遗传对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

第一，横向遗传是个体优化的基本条件。纵向遗传总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进行的，遗传的内容和质量必然受到该情境所包含的时间、文化的地域发展水平等条件的限制。横向遗传突破了这种局限性，使该地域之外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得以遗传给下一代，实现个体社会遗传过程的最优化，同时也优化同时代的社会成员。

第二，横向遗传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可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是通过发明创造实现的发展，如历史上的科技革命导致社会的巨大进步。二是通过继承实现的发展，如通过吸取和继承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而发展自身。相对而言，继承式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它是一种最直接、最经济、最迅速的发展形式。日本民族并不是一个创造力旺盛的民族，但却是最发达的民族之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明治维新”以后把继承式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模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具有极强的吸收消化能力。此外，继承式发展对于创造式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制约作用。某一学科门类、某一地域的发明创造，如果不能为其他地域和其他学科门类的成员所掌握，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必定是有限的。从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人类对自然和社会某一方面认识的突破是对其他方面认识发展的结果，脱离人类认识整体发展水平在某一方面单独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由于横向的社会遗传，人类各种认识成果在不同学科门类、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迁移，促进了不同认识领域和不同发明创造的产生。

第三，横向遗传促成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横向遗传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其他社会发展形式的制约作用，而且在于它本身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巨大促进作用。如果说纵向遗传避免了异代之间的重复发展的话，横向遗传则消除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重复发展。一个具有广泛包容力的民族必定是最发达的民族。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吸取全人类的一切最优秀的文化成果，使自身始终站在各民族文化之巅。

人类社会具有加速度发展的规律，近百年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过去数千年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来自于横向遗传。横向

遗传既使单个的、分散的社会实践力量结合为相互依赖的整体力量，同时又通过相互继承提高了各部分社会实践力量的整体水平。横向遗传的规模越大，社会发展的速度越快。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例来说，资本主义建立了以市场为依托的商品经济。市场从表层看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场所，从深层看是把单个的社会实践能力结合为类能力的纽带。市场打破了封建庄园封闭式的简单重复劳动，使商品生产者得以利用自己这方面的发展成果去交换别人其他方面的发展成果，从而产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力量集合，把分散的力量联合为整体力量。而商品的价值规律又自发地调节人们的行为，迫使他们去创造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新商品或品质更高的商品新类型，消除社会的重复劳动和重复发展现象。随着横向联系范围的扩大，随着由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内部力量的联合向全人类联合的转变（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人类发展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

三 改革开放是社会横向遗传的过程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其意义不亚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西方社会发展的意义。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僵化体制，消除了对外拒人类文明于国门之外，对内小而全、条块分割的观念和体制屏障。“对外开放”即是要大量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社会实践能力，避免再走先进国家已经走过的曲折发展道路；“对内搞活”即是要把自身分散的潜能建构为一种整体能力，避免自我重复。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种横向遗传过程，改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和举世瞩目的发展速度，正是因为这是一次横向遗传过程。

历史上有许多因闭关自守而使社会发展停滞、落后的例子，也有许多落后国家因实行对外开放而使社会发展发生质的飞跃的典型。俄国的沙皇制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因为打开国门，广泛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術而由农业社会一跃成为发达工业国家，使社会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质变。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尽管与俄国沙皇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有许多区别，但就社会发展的主导形式而言，都是继承式发展；就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言，都是革命式的、质的飞跃。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经济的急剧增长。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①“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②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社会遗传实现的继承式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改革与开放是社会横向遗传发展形式的一体两面。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革。他说，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①。改革与开放在社会横向遗传过程中相互依存，互相促进。一方面，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中国 20 世纪后半叶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其根本目标是要通过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来改造现存的、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合理组合。这种改革是以开放为前提的改革，是建立在开放基础上的改革。另一方面，没有改革也谈不上开放，开放必须以改革为前提和基础。从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变。它客观上要求越出一国的国界，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使一国的生产要素通过在国内更大范围的合理流动，来达到优化配置，达到高效率和高效益的目的。这就要求改革原有的僵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模式，使之与国际社会接轨。不改革旧有的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就难以进行。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它引起了 20 世纪末叶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造成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方面，而且表现在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方面。因此，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的急剧变化正是我们时代的突出特征。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7 页。

第 二 节

社会变量——影响社会心理的重大因素

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不如意识形态理论化、系统化，但它比意识形态或其他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更直接、更迅速、也更敏锐，且其反映的强度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强度成正比。研究转型期的社会心态不能不探讨引起社会心态变化的社会环境因素。

改革开放带来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中的一些主要方面便成为当前社会心态变化的重大社会变量。这些变量主要是社会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冲突的加剧等。

一 社会体制的转轨

中国社会最深刻的转型开始于体制的改革，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体制的转轨给传统稳态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引发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大幅度调整、旧有文化价值体系的分化，并进而促成社会成员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体制改革的方式、范围、内容、程度以及每一阶段性特点都会影响到社会变迁的性质、方向、深度和范围，从而构成对传统社会心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社会心理的每一次震荡都与改革直接相关，转型期社会心理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体制改革由浅入深的过程。推动社会全面而深刻转型的体制改革是社会心理变迁的深层动因。中国的改革根据其进程可划分为早期、中

期和完成期三个阶段。早期在时间上大致为 1978—1993 年。这一阶段的改革具有渐进性、单一性、表层性、自下而上性等特点。1993 年以前，十多年的改革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渐进性。大部分改革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推广的过程。这一特点体现在物价改革、所有制改革、农业经营方式改革等几乎所有方面。第二个特点是单一性。几乎所有的改革方式都采取单项突破方式。在一段时间集中对现存体制的某一方面进行改革，取得突破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调整和巩固，再开始另一方面的改革。如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到价格改革，再到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等等。第三个特点是表层性。改革内容大都是旧有体制的外壳，较容易的方面。一般都是首先放松原有体制的管制，释放被旧体制压抑的能量，而不触及体制的“硬核”。如通过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依赖吸引外资和外延扩张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第四个特点是自下而上式。通过放权让利调动广大群众和各利益群体的积极性，使其自觉地、热情地投入改革大潮。发挥其创造性，在各地广泛地进行“试错”性实验，放手让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经验，经过各种类型的“试错”，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放权让利主要是国家向改革参与者、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如向农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经营自主权，取消统购派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税制；对地方大幅度地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实行地方财政包干等等。放权让利的结果是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地方和生产经营者个人的积极性，掀起了一股股群众自发参与的改革大潮，创造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如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等等都是在广大农民伟大创造的基础上，得到中央肯定而确立下来的。

正是上述特点，使我国的改革极大地区别于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形式的改革，成为保证早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渐进式改革一方面将改革成本由一次支付变为分期支付，减缓了改革带来的阵痛和对社会生活的震荡程度，为纠错和调整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为老百姓适应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心理训练和适应期，使其心理承受能力随着改革的进程而逐渐得到提高，认识和态度与改革过程达到同步或一致。这是改革始终得到老百姓支持和拥护的重要前提之一。没有老百姓的积极支持、拥护和参与，任何好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实行，亦不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一意义上说，渐进方式在心理环境的营造方面的作用比成功的制度方案更重要。

改革的表层性，即选成本较低、实行容易、又能明显收益的领域进行，而且改革使大多数参与改革的人都能从中受益。通过放权让利实现自下而上的改革，以及单项突破的方式都大大降低了改革的难度，减少了改革带来的震荡和连锁反应。由于老百姓直接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因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吸引他们踊跃参与改革，使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接受和拥护改革，把他们由改革的客体转变为改革的主体。

但是，进入 90 年代，旧有改革模式的容量已接近极限，改革的早期阶段已基本结束，其负面效应已越来越突出。依据主要有：第一，原有体制的能量已释放完毕。这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比重下降。按国家统计局 1994 年的农业投资分类方法计算，农业投入占基本建设的比重，1985 年为 1.6%，1990 年为 1.5%，而 1995 年为 1.0%。时至今日，农业基本建设已无老本可吃。国有企业已背上难以卸下的沉重历史包袱。

第二，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方式走到了极端。这表现在国

民收入的分配倾斜严重。如 1978 年，在国民收入中，国家、集体和个人所占比重分别为 32.8%、9.9% 和 57.3%；而 1990 年，这三者的比重分别是 16.2%、11.2% 和 72.6%。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995 年比 1978 年增长了 140 倍。全国城乡居民新增储蓄存款余额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5 年达 51.8%，而国家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仅为 10.9%，这为金融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阻碍了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放权让利同时造成了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使得集团消费、公款消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行政开支的恶性膨胀，行政成本大幅度提高。据统计，1978 年到 1995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仅增长 5.1 倍，而仅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就增长了 17.8 倍。各单位、各部门利用放权让利获得的权利大搞创收，倡导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结果是一些非营利的部门和单位，利用手中权力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或者从事本职能以外的创收。因此，放权让利到后期已不再是调动各部门的改革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良行政行为、集团消费、社会消费攀比风气的一个驱动因素，对社会稳定和政府的正常运作构成威胁。

第三，外延扩张的高投入增长方式达到极限。这表现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大量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出现结构性过剩，劳动成本快速增加，国有工业经济效益持续滑坡等方面。^①

第四，由单项改革带来的制度不完善，成为社会风气恶化的

^① 参见李培林等著《中国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与面临的挑战》，载《社会学研究》1997 年 1 期。

一个重要原因。腐败现象加剧、行政不履行职务行为和履行与职务无关行为增加，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社会道德大幅度滑坡，等等，这些消极现象已到了非通过制度创新加以整治不可的地步了。

1994 年国家在财税、金融、外贸外汇等领域重大改革的推行，标志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已进入中期阶段。这种转变的趋势是：在程度上由易入难；在方向上由外围进入“内核”；在方式上由渐进式、单项突破向一次性、整体配套转变；在主体上由自下而上向自上而下转变；在制度功能的发挥上，由以释放旧体制能量的激励功能为主，向以制度对行为的规范、约束功能为主转变。

在改革中期，由于改革初期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所带来的问题已凸显出来，社会结构中的重大利益关系需作出调整。如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国家利益与地方及个人利益、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公正的维护、市场秩序与显性收入、腐败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等问题大都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合理与否往往又关系到改革成果能否巩固，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说到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坚持和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发挥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社会转型、社会结构走向和理想现代社会的建构问题。由于在调整上述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关系时，国家再也不能依靠放权让利手段，而是要求个人、集体、企业、发达地区等过去在改革中正当获益的利益群体分担其应负的责任和费用，控制和消除不当获益现象。这就需要制度的创新和完善，需要采取自上而下的一次性、整体性改革措施。由于新阶段改革使许多参与者不能直接获益，而是需要

作出某种程度的牺牲，因此，必将引起改革心理的某种程度的变化，也使整个社会心理的变化状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初步建立起整体性制度，在发挥制度的激励、引导功能的同时，强化制度的调节和控制功能。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在制度完善、行为有序化的同时，培育和建设新的制度、体制相适应的、稳定健康的社会心态，提高人的素质，使之能适应社会转型和未来社会的需要。

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将是对第二阶段成果的巩固、调整和完善期。

二 社会结构的变迁

70年代末开始的体制改革将我国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在优化社会结构、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使传统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对以往传统的稳态社会心理结构产生了巨大震荡和冲击，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心态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不同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秩序所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社会结构是从静态的角度对社会系统构成要素及构成方式所作的考察。社会转型则是从动态的角度对社会系统要素构成状况、流动变化及变化机制的改换所作的考察。导致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形态变化的原因有可能是政治或上层建筑的，如革命的发生或外力的干预，我国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以前社会的转型大抵源出于此类；社会转型也可能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化，

俄国沙皇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和我国 1978 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则可归于此类。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就其广义而言，是指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开放型的社会转化。这种转化开始于 1840 年，但 1978 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这一转变过程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二是引起转型的原因由上层建筑因素为主导转变为以经济基础即体制改革为主导。狭义的社会转型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本书所论及的社会转型均是在狭义意义上使用。

体制改革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社会结构的转型。一方面的因素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和社会资源外延的扩展。改革开放前，国家是掌握社会资源的唯一力量，国家计划分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这里所说的资源，不仅包括以货币和生产、生活资料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物质资源，而且包括教育、制度、信息等无形资源）。社会生产的组织和要素流动受国家权力强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专门的权力部门，如计划部门、商业部门、金融和财政部门等实施。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资源也由国家统一分配，最多借助于集体进行具体的二次分配，个人在国家 and 集体之外得不到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国家主要依据身份来分配资源，这些身份有政治身份（阶级出身、党与非党等）、城乡户籍身份、职业身份等等，这就使得个人全面地依附于国家，很难成为社会中积极、活跃而富于自主和创造性的主体。由此在心理上造成社会成员，特别是城市职工的被动依附型人格和强烈的依从心理，这成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心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国家也就担负着超乎其能力的向社会成员

提供一切生活条件的义务。改革开放之后，由以往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市场逐渐取代国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和形式，国家力量退居到避免垄断、克服外部效应、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进行长期战略投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经济社会公正、安全和稳定的领域。同时，随着国家退出企业管理领域，行政放权和承包、股份制形式的出现，企业单位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企业也成了资源配置的一种力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的增加，使资源的外延得到大幅度扩展，过去不作为资源的知识、技术、声望、人际关系等等都成了有价值的资源。

另一方面的因素是社会整合力下降。所谓社会整合，是指社会结构的不同构成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的程度。改革开放前，国家对社会采取的是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以一元化的意识形态、集权体制和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为基础，通过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领域的全面行政控制实现社会整合。由于国家不仅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主要资源，而且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接近和进入国家配置的资源的所有活动空间^①，使得国家拥有社会整合的绝对力量。个人如果要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资源，就必须进入国家控制的资源配置活动空间。首先要获得农村或城市的户口，同时要加入一定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或国家单位。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社会成员。这意味着在农村拥有了参与劳动和获取一份生活资料和生存资料

^① 活动空间是指从事社会活动的具体领域和场所。改革前的中国，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活动领域均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任何活动均是不允许的。

（自留地）的权力；在城市，拥有了就业和住房、公费医疗、子女就学就业、粮食和副食品定量供应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等资源获取的权力。由于个人在获取生活资料的条件和机会上强烈地依赖于国家，因而国家对社会可进行有效而全面的整合。这种整合反映了改革前体制的弊端：扼杀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人民导入思想和政治的误区，因而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抵触和改革的强烈愿望，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国家原来赖以进行整合的基础随之被削弱，行政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这表现在：单一所有制被突破，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由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社会资源配置力量由政府主导转为市场主导，相应地个人的活动空间被大大扩展。个人对国家的强烈依赖已大为削弱或丧失，在某些领域国家所能提供的生存和发展资料甚至远不如个人在自由活动空间中独立获取的多。随着国家简政放权调动群众和地方的积极性，原来高度垄断的资源向地方分流，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时有发生。国家已不可能依靠单一的行政权力对社会进行整合。

社会整合力下降的另一表现是，传统整合因素的作用逐步降低。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传统社会依赖两个主要因素对社会进行整合。一是组织因素：家庭、家族、村社等；一是思想文化因素（心理因素）：亲情、传统伦理道德、社会舆论、习俗等等。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生活急剧变化，旧的习俗因不适应现代生活已逐渐成为古董，新的时尚又难以巩固下来成为习俗。家庭、血缘、地缘关系松懈。尽管在农村出现了